

引言

歷史，女性和中國的抗日戰爭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美國、歐洲以及亞洲其他地區，口述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但中國與二戰史的研究中，尤其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婦女史的研究，口述歷史卻並不多見。現存關於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學術著作大都傾向於關注重大歷史事件和從事政治活動的男性歷史人物，研究的框架也多以男性經歷為中心，強調以男性經歷為基礎的戰爭衝突理論。相對而言，有關個人回憶的口述歷史，特別是普通婦女的經歷，以及這些經歷提供的歷史啓迪，很少能夠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本書是一部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婦女的口述史。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將抗日戰爭女性化，進而將其人性化和正常化，而是展示抗日戰爭中，中國婦女、特別是重慶婦女的經歷。我認為戰爭本身並不能賦予婦女力量，使她們變得強大；是反抗侵略、而非戰爭，使中國婦女經受了磨練，獲得了力量，變得強大。

本書有三個主要目標。**第一，它旨在將口述歷史和個人回憶引入婦女和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之中。**它關注的是1938年到1945年期間，生活在國民黨控制下的戰時陪都重慶的婦女的生活，以及她們各種各樣的戰時經歷。本書記錄了35位中國婦女的口述歷史，她們都是抗日戰爭的倖存者，她們的故事都是作者通過採訪而收集的。將這些戰爭記憶注入抗

日戰爭研究中，其目的同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在他關於「記憶與美國歷史」的研究中提出的觀點是一致的：

研究歷史記憶能提供令人振奮的新機遇，使我們能夠對傳統的史料和研究課題提出新問題，作出新的綜合分析。因為對歷史記憶的研究能將專業化及特殊化的題目聯繫起來。有關歷史記憶的問題，通常自然地來源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經歷，它可以連接史學界和認為專業歷史同現實生活距離太過遙遠而無法觸及的廣大受眾。¹

一名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在他關於英國工業化和工人階級研究的開山之作中也告誡我們，要通過吸收和認可普通群眾的個人經歷來擴充我們對過去知識的認識。²在中國抗日戰爭歷史中，普通婦女作為一支社會力量，一直以來不僅沒有話語權，而且常常被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忽視。

口述史對還原歷史記憶非常重要，因為它特別能揭示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受壓迫人民的經歷。例如，研究中國抗日戰爭的學者們都知道，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物資嚴重匱乏，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及生存造成了極大影響。重慶檔案館和歷史圖書館所藏大量文獻資料可以證明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物資短缺。但是檔案館、圖書館的文獻數據卻無法告訴我們，物資短缺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甚麼樣的影響，口述史則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到目前為止，有關普通中國人抗日戰爭經歷的文獻很少，抗日戰爭時期普通人的歷史數十年來都未受到學者的重視。故而，口述歷史對於普通中國人、特別是婦女的戰時經歷的重塑是十分重要的。口述史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抗日戰爭時期社會性別的差異化和戰時社會的政治生活，還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瞭解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其他方面的社會結構不平等的問題。

¹ David Thelen, "Memory and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4 (1989): 1117-1129.

²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美國一位傑出的女性問題專家指出，如果仔細研究婦女在戰爭中的經歷，尤其是那些以口述歷史為根據的部分，我們很快會發現戰爭造成的巨大傷亡和普通人權力的被剝奪。在口述史中，婦女的經歷與官方為動員全國支持戰爭而強調的英雄主義和英勇無畏的宣傳形相形成鮮明的對比。³同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史中也存在個人經歷與官方宣傳之間的差異。本書記錄的口述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抗日戰爭存在至少兩個版本的故事；在抗日戰爭中，國民情緒也同樣存在兩面性。一方面是官方版本公開宣揚的、全國人民以高昂情緒投身於抗日戰爭的故事；另一方面則是鮮為人知的個人經歷，以及被死亡和痛苦籠罩著的民族悲哀。我們往往認為官方樹立的英勇抗日戰爭形象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全盤接納，卻忽視了承載戰爭和這種官方形象的個人所遭受的苦難。

我需要在此申明，本書口述史揭示婦女在抗日戰爭中遭受苦難的目的，並不是要將中國婦女扮演成被動的、可憐的受害者角色。一般來講，在世界戰爭史和暴力衝突中，婦女經常被描述成悲痛無助的母親和妻子。但是近年來一些關於南亞武裝衝突及美國二戰時期的婦女研究，都顯示了婦女在戰爭中有著多種多樣的形象，扮演過各種不同的角色。本書的口述歷史也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婦女有著多面的形象——她們是動員、宣傳、支持抗日戰爭和戰時生產的積極分子，也是抗日戰爭期間性暴力和經濟困難的受害者，還是生存策略策劃者和家庭社區事務管理者。以往在對軍事暴力衝突的學術研究中，婦女在戰爭中的各種個人經歷往往因為得不到認同而被忽視。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將這些被忽視的個人故事，引入學者的研究視線，讓普通婦女也有屬於自己的公開話語權，並且「使她們的經歷

³ Joan W. Scott, "Rewriting History," in *Behind the Lines: Gender and the Two World Wars*, ed., Margaret Randolph Higonnet, Jane Jenson, Sonya Michel, and Margaret Collins Weitz. New York: M.E. Sharpe, 1989, p. 28.

滲入公共領域」，寫進歷史，而不再僅僅是與歷史無關的個人故事。正像一位印度學者對南亞武裝衝突中婦女的描寫的那樣，我們應當把本書中的婦女的經歷，看作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學術資源和空間。⁴

本書希望這35位重慶婦女的個人故事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瞭解普通婦女如何應對抗日戰爭，度過日復一日的戰時生活。一般的抗日戰爭史很少涉及人文維度的討論。美國歷史學家Parks M. Coble指出，在現存的學術研究中，抗日戰爭的人文維度往往被忽視了。⁵認識抗日戰爭的人文維度，可以幫助我們對抗日戰爭史有更全面的瞭解。戰爭的人文維度的主要觀點是：戰爭是人造的，對戰爭影響最大的是人，受戰爭傷害最大的也是人，特別是普通人。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婦女的經歷，可以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人文維度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並幫助我們認識人與戰爭的關係。只有當人們深刻意識到人與戰爭的關係時，人類才有可能減少或消滅戰爭。

總的來說，接受採訪的重慶婦女們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教育背景。不同的政治因素使她們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這場抗日戰爭，並留下了不同的記憶。然而共同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她們，又或多或少地擁有某些共同記憶。這些記憶不僅使這些倖存者的故事有生動的細節，也向我們展示了她們對抗日戰爭的情感和看法，從而瞭解到這場戰爭對於她們每個人分別都意味著甚麼。第一手的回憶資料，正如美國學者Philip West、Steven I. Levine和Jackie Hiltz所指，「對表達戰爭的意義和形式都是無價的」。⁶這35名重慶婦女的個人回憶提供了有關抗戰期間大後方私人

⁴ Rita Manchanda, ed., *Women, War, and Peace in South Asia: Beyond Victimhood to Agency*. New Delhi: Sage, 2001, p. xiv.

⁵ Parks M. Coble,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China Quarterly*, 190 (2007): 394–410.

⁶ Philip West, Steven I. Levine, and Jackie Hiltz, ed., *America's Wars in Asia: A Cultural*

領域的許多具體信息，這在中國抗日戰爭研究中尚屬一個相對空白。我認為只有當公共的故事和私人的故事都講出來，文字記載的歷史和口述的歷史都寫下來，我們才能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經歷的史實有更深入完整的理解。

中外學術界對於歷史和記憶在戰爭研究中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已經做了大量研究。然而，一般而言，現存有關二戰歷史與記憶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幾個重大的問題上，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廣島、長崎遭受的原子彈襲擊和南京大屠殺等。上述研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本書也不是要否認其重要性，而是想指出史學界也應當關注那些普通的、沒有那麼富有戲劇性的戰爭題目。之前西方出版的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著作大都集中於研究以男性為中心的軍事歷史，如戰時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文壇精英創作的文學作品，以及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分別在國統區及紅色根據地從事的現代國家建設。由於現存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著作大多都未包含普通人民的聲音，這35位重慶婦女的口述史，以及她們帶給我們的戰爭記憶，就如南非社會學家Belinda Bozzoli在她的研究中提出的一樣，是用一種非完美的方式重現了歷史，並為學者們提供了一條瞭解甚麼才是抗日戰爭「真實」面目的途徑。⁷

在現代婦女研究中，西方學者們早就提出了「個人的就是政治的」觀念。女性私人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往往反映出政治和社會中複雜的權力關係。不同身份的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的個人故事重新展現出當時的物質條件、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生活，以及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精神狀態，使我們能以非正式的、感性的和生動的方式瞭解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陪都的各種政治權力關係。例如，我們知道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大後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M.E.Sharp, 1998, p. 12.

⁷ Belinda Bozzoli, with Mmantho Nkotsae, *Women of Phokeng: Consciousness, Life Strategy, and Migrancy in South Africa, 1900–1983*. London: Heinemann, 1991, p. 6.

方，抗日戰爭時期通貨膨脹和經濟困難的情況十分嚴峻。雖然現有的學術著作都以醒目的統計數據記錄了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通貨膨脹，但我們往往無法從生硬的數據中知道這對當時的普通人到底意味著甚麼，對他們的生活到底有甚麼樣的影響。本書口述史中普通婦女們對抗日戰爭時期重慶通貨膨脹的個人敘述，則提供了具體而生動的情節，幫助我們瞭解抗日戰爭時期通貨膨脹和經濟困難帶給普通人民的巨大痛苦。而抗日戰爭時期普通民眾經歷的經濟及生活困難，以及他們應付這些困難的方式和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們揭示了普通民眾與國統區政府的關係。

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記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在西方的中國史研究中，集體記憶及公共領域也是流行的研究題目。很多學術著作和學術會議都在致力研究，用西方學者Richard Madsen的話來說就是，「使一個小團體融入一個社區的集體記憶」⁸，或如David Thelen所指出的，「探索個體如何與大歷史進程聯繫起來的新的可能性」。儘管Madsen指出，大多數關於公共領域的研究都聚焦在非政府的民間社會，但我認為這些研究主要還是試圖把個體融入整體，並強調整體的重要性和體現團體的特徵。這種研究往往忽視了個體如何將歷史進程個人化。個人經歷和民族歷史是相互影響並呈交叉狀的。抗日戰爭倖存者的口述史資料可以幫助我們從多個層面瞭解到抗日戰爭中個人歷史和民族歷史的交叉性，而不僅僅局限於個體與個人記憶是怎樣被融合進整體和公共歷史中。

實際上，這35位中國婦女的個人記憶向我們揭示出陪都大後方形形色色的面目，既包括了英勇的全民抗日戰爭，也顯示了戰時社會的混亂，以及不同人群對抗日戰爭意義的理解和衝突。與歐洲和美國在二戰時期發生的情況類似，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婦女的共同記憶和個人記

⁸ Richard Madsen,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19.2 (1993): pp. 183-198.

憶之間也同樣存在差異。雖然抗日戰爭時期的檔案資料和婦女刊物記載和發表了許多有關婦女的資料，但這些文字記錄多半代表集體記憶。雖然它們也反映了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經受的磨難和面對的挑戰，但基本腔調仍屬於激昂的官調，目的是為了尋求全民對抗日戰爭的支持，故而強調英雄主義和英勇無畏的民族形象。譬如，1937年應澳大利亞某刊物要求，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寫了一篇名為《戰爭與婦女》的文章。在該文中，她對全世界說：自打抗日戰爭爆發以來，中國各界婦女都積極奮發地為支持抗日戰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領袖，建立起各種組織機構，為抗日戰爭提供協調和協助，與此同時，女服務員和舞女則紛紛到醫院和慈善機構當志願者，普通家庭婦女也都自覺自願地照顧流浪兒童。在宋美齡看來，正是這場戰爭將中國婦女不會誇誇其談、只會努力做事的優秀品質表現了出來。⁹在她的公開演說中，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時遭受的苦難被褒揚成民族英雄主義和中國人民頑強生命力的體現。

西方學者 James M. Mayo 指出，任何社會在戰爭時期都需要將其集體的戰爭記憶神聖化，以此證明人民血和犧牲都是有價值的。這種流血犧牲被用作「社會之精神支柱」以掩蓋發動無人道戰爭的國家形象。¹⁰與此相反，本書的目的則是避免把戰爭記憶神聖化。本書中的口述材料，即那些個人的抗日戰爭記憶，不僅僅揭示了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同時也記錄了戰爭造成的家庭成員死亡和人民的苦難，也就是戰爭的無人道性。戰爭會造成流血犧牲。就算是正義的、反抗侵略的抗日戰爭，受傷害最多最大的也是普通中國老百姓。正如美國一位著名學者 Joan W. Scott 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私人與公共空間、家庭與國家、母親們的需要與國

⁹ 宋美齡，〈戰爭與中國婦女〉，《蔣夫人言論匯編》，台北：中正書局，1956年，第77-85頁。

¹⁰ James Mayo, "War Memorials as Political Memory," *Geographical Review*, 78.1 (1988): 75.

家的需要、個人的犧牲與國家的存亡之間的差異，對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意識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¹¹ 想要對婦女的戰時經歷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有更深入詳細的理解，關注集體記憶和私人回憶之間的差異尤其重要。這種差異會幫助我們瞭解社會性別在抗戰時期的表現和抗戰期間各種政治思想運動的複雜性。

本書的目的之二是展示中國的抗日戰爭史實際上是一個社會性別化的課題。現存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西方著作幾乎都沒有涉及抗戰時期重慶婦女的經歷，因此，知識構建過程中包含的女性視角和見解也就遠遠不夠完善。將抗日戰爭中重慶婦女的故事納入歷史敘述，不僅給予她們話語權，更對補充與挑戰了有關抗日戰爭的知識的構建政治。印度學者 Rita Manchanda 在她關於南亞戰爭中的婦女的研究中指出，一旦婦女們遭到暴力衝突，她們就會創造出特殊的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及國家等方面的現實條件，並使它們逐漸演變成一門新知識的基礎和源泉。¹² 只有當女性為中心的故事獲得一定的空間和地位，她們才能成為知識構建過程中的一員，從而使我們能有更充實的知識基礎，瞭解更完整的抗日戰爭歷史。本書力求從近現代史上在暴力衝突中主張男女平等的學術成就中，借鑒一些觀點及見解來說明，男女平等理論及其社會性別分析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抗日戰爭時期社會性別關係在重慶地區的演變，也能提供關於中國抗戰史研究中，以女性為中心的另一種視角和版本。

本項研究還試圖探討抗日戰爭中「社會性別」與集體及個人記憶之間的關係和區別，展示抗日戰爭期間「社會性別」形成的複雜性，並講述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本身的複雜性。本書記載的重慶婦女在烽火歲月裡的故

¹¹ Joan W. Scott, "Rewriting History," p. 28.

¹² Rita Manchanda, ed., *Women, War, and Peace in South Asia: Beyond Victimhood to Agency*, p. 20.

事，告訴我們在探尋社會性別標誌的過程中，如同歐洲和美國婦女在二戰中一樣，中國婦女也必須得在公共和私人需求之間、在國家與家庭之間、國家需要和個人需要之間、國家存亡和個人生死抗爭之間，以及社會劃分給男性的陽剛英雄主義與劃分給婦女的陰柔韌性之間不斷博弈。

本書的口述記憶揭示出，儘管全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都飽受磨難，但這種磨難帶有社會性別差異。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的婦女經歷了許多女性特有的苦難。比方說，戰爭期間極端艱辛的生存條件，使很多母親在戰爭中失去自己年幼的孩子；許多婦女在戰爭中承受了加倍的生育之苦，還有些婦女則由於生活艱難、社會動亂，根本無法考慮生育兒女。再如，儘管抗日戰爭前後，中國都存在著對女性的性侵害及性虐待，但戰爭造成的混亂卻使許多婦女更加容易受到性侵害和性虐待。在西方，婦女在軍事衝突中遭受的性暴力，尤其是近三十年來婦女在世界各地軍事衝突中飽受的蹂躪，已經受到學者關注。近年來以婦女在戰爭中遭受的性侵犯為主題的學術研究已成為熱門話題。然而相比之下，以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經受性迫害為主題的學術研究卻寥寥無幾。現存關於抗戰時期中國婦女遭受性暴力的中英文著作，大都將焦點集中在參戰士兵對中國平民婦女的性暴力上，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殺中遭受日軍強暴的婦女和在日軍中飽受性虐待的「慰安婦」。而對於婦女在抗日戰爭中非軍事區域裡遭受的其他形式的性侵犯和性虐待卻極少有人關注。本書收集的口述史中至少有三位女性（劉群英、趙知難和任再一）提到了親身經歷過和目睹過的男性對女性的性侵犯。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吸引學者注意，從事該類課題的研究。

我們也應當注意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普通婦女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及其對抗日戰爭和國家的貢獻。美國學者 Deborah Halstead Lennon 在她關於婦女研究重要性的思考中指出，婦女對社會（在這裡指戰爭）的貢獻通常都錯綜複雜地交織在日常生活中，並被日常生活所掩蓋，以至於現存的學術研究對這些貢獻都視而不見。因為婦女們的日常生活對學者們來說

太過熟悉，也太過普通了。¹³現存有關抗戰時期重慶婦女的工作和貢獻的公開歷史記錄，大多局限於她們在公共領域內的工作，特別是在工廠和機關所做的事務和貢獻；而她們私下在家庭裡的工作和貢獻卻常常沒有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材料。我認為，普通婦女的個人經歷是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研究抗日戰爭的寶貴材料。雖然重慶地區的有些婦女在抗日戰爭時期確實從事著公共領域內的工作——她們在工廠裡勞作、在機關裡上班、在學校教書和讀書，我採訪的婦女中有許多都是家庭婦女。她們每天的工作是煮飯、洗衣、帶孩子、像家僕一樣勞作，並且在照顧家人之餘，在街上售賣自製的家庭手工品。她們沒有薪金，也無法計算自己勞動的價值。然而正是這些未被記錄下來的工作與生活技術和生存藝術，幫助無數中國家庭度過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並使全國人民的心智凝聚起來。這些表面看來只是家庭瑣事的普通行為，實際上是強有力的民族生存行為。古人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婦女們理家的日常生活，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國家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賴以生存的重要條件，也是一種非正式形式的抗日民族主義。這種非正式形式的抗日民族主義應該被包括在抗日戰爭歷史研究之中，並予以高度重視。

西方學者 Paula Schwartz 在她關於法國二戰時期婦女運動的研究中指出，由於大部分法國婦女都是以日常生活中不顯眼的家庭主婦、學校教師等自然身份參與反抗法西斯的地下鬥爭，所以戰後關於反抗法西斯鬥爭的學術研究沒有對戰時法國婦女的經歷給予令人滿意的地位和認可。然而，她堅持認為有必要重新定義反抗法西斯鬥爭，並將法國婦女參與的有組織的地下活動和她們的日常職責都納入到反抗法西斯歷史的研究

¹³ Deborah Halstead, “Why Women’s Studies?” in *Women: Images and Realities*, ed., Amy Kesselman, Lily D. McNair, and Nancy Schniedewind, California: Mayfield, 1995, pp. 31–32.

中來。¹⁴我認為，我們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反抗侵略」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的釋義。

在現有的學術研究中，有關婦女、特別是在國統區大後方的婦女，並沒有被納入抗日戰爭史的「反抗侵略」的研究。而且由於絕大多數大後方的普通婦女所從事的，都是被人們認為是女人理所當然的普通工作，比如照顧家庭和帶孩子，她們的努力和貢獻並未被學術界看作是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工作。大眾通常把「反抗侵略」社會性別化，認為是男性的行為，而且只有男性才有能力反抗。因此，在中國有關「反抗侵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男性社會及其成員上，如男性士兵、政黨領袖和知識分子等等，而不包括普通婦女。因此，將重慶婦女在抗日戰爭時大後方的日常經歷加入學術研究，可以揭示婦女維持個人與家庭的生存同樣是反抗侵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借用英國學者 Angela Woollacott 在其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婦女的研究中的一句話，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重慶地區，「婦女才是國家存亡和人民生命的支柱」。¹⁵ 在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到許多生動的例子，瞭解重慶婦女如何頑強生存和拒絕死亡，如何表現反抗侵略的鬥爭和精神。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一定要把普通中國婦女的經歷，以及她們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參與反侵略戰爭的行為寫進歷史，並將其作為研究中國反抗日本侵略史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抗日戰爭有比較全面的理解。

本項研究也為我們提供機會，重新評估在抗日戰爭中，誰具有男女平等思想和社會性別意識，誰在按照男女平等思想和社會性別意識積極

¹⁴ Paula Schwartz, "Redefining Resistance: Women's Activism in Wartime France," in *Behind the Lines: Gender and the Two World Wars*, ed., Margaret Randolph Higonnet, Jane Jenson, Sonya Michel, and Margaret Collins Weitz,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1–153.

¹⁵ Angela Woollacott, *On Her Their Lives Depend: Munitions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行動、參與抗日戰爭活動。以往的學術著作通常認為，只有中產階級和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婦女，才會有意識地追求社會性別的代表和男女平等的權力。普通婦女往往被剝奪了尋求社會性別個性的意識，因為一般來講，有記錄的歷史只屬於社會的精英階層，而且知識的構建過程也從來不包括普通人民的聲音，尤其是普通婦女的聲音。如果我們承認，婦女對日常生活及生存方式的管理和創新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反抗侵略的一部分，那麼，普通中國婦女也完全有能力擁有社會性別意識和追求男女平等的權力。因為戰爭是非正義的最高暴力形式，如果普通的中國婦女能有意識地用日常生活反抗侵略，那麼她們也可以有意識地爭取自身的平等權力和解放。

西方學者 Margaret R. 和 Patrice L. Higonnet 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歐洲婦女的文章中指出：「即使是對新的日常經歷的簡要揭示，也可能在理論上使我們對一些範例的接受程度產生革命性的影響」。¹⁶雖然在抗日戰爭中，絕大多數普通中國婦女中都不知道或不明白理論概念上的社會性別關係，但她們卻清楚其在具體實踐上的意義。戰時經歷使她們更清楚地意識到，生產力關係中的社會性別分工，以及過去從未被質疑過的婦女在傳統概念上的主內的角色到底意味著甚麼。例如，在我的採訪過程中，這些重慶婦女都強調，在抗日戰爭中作為一名女性生存有多麼艱難，以及她們在抗日戰爭中照顧家庭並確保家人生存的責任有多麼沉重。抗日戰爭期間，就像那些在南亞衝突中生活的婦女一樣，戰爭也造成了與婦女生活水平極度相關的物資稀缺，而社會分配給她們的養育小孩和照顧老人的種種職責，履行起來都更加困難。這些經歷都加深了她們對自己扮演的社會性別角色的具體的和實踐性的理解。

¹⁶ Margaret R. Higonnet and Patrice L. Higonnet, "Double Helix," in *Behind the Lines: Gender and the Two World Wars*, ed., Margaret Randolph Higonnet, Jane Jenson, Sonya Michel, and Margaret Collins Weitz. New York: M.E. Sharpe, 1989, p. 31.

現有有關二戰時期美國和歐洲婦女的研究中，備受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改變」：最熱門的話題是戰爭以何種程度、通過哪些途徑改變了歐洲和美國婦女的生活及地位，以及這些改變能否在戰後持續。我認為這種問問題的方式本身就存在問題。它將婦女置於無能和被動的位置。因為這樣的問題事先已經假設，歐洲和美國婦女的生活一定被戰爭改變。而本書研究的不僅僅是中國婦女的生活如何被抗日戰爭改變，同時也將婦女放在主動位置上，研究婦女參與全民抗日戰爭對戰爭和戰時社會、政治及經濟體系起了多大的影響。這樣中國婦女也可以成為抗戰歷史的主動創造者，而不僅僅是被動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

總體而言，婦女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在抗日戰爭中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沒有她們的犧牲和貢獻，中國根本無法堅持八年艱苦的抗日戰爭。為了保留婦女對抗日戰爭的支持，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和延安的共產黨政權都不得不承認，婦女在抗日戰爭中極其重要的貢獻，並對婦女要求的權力和自由作出一些讓步。

儘管一些針對婦女的特殊權力和自由而制定的戰時政策，譬如對軍屬婦女的經濟援助以及培訓婦女掌握戰時生產技能等措施，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由於緊接著的內戰而被取消，但婦女作為一個整體及社會群體，在中國戰時及戰後的政治舞台上仍成為一支越來越強大的政治力量。例如，1938年國民政府批准國民參政會的成立，就是為了團結各界人民支持抗日戰爭而作出的讓步。國民參政會自1938年持續到1948年，共歷四屆，舉行大會十三次，其中十一次都在重慶舉行。由於國民參政會的成立，中國民國史上首次出現了少數幾位婦女領袖被任命為參政會參議員的局面。儘管女性參議員只佔國民參政會總人數的10%，婦女積極分子還是把握時機，切切實實地加入到了抗日戰爭政治實踐活動中來。從現存有關國民參政會的資料中可以看到，雖然女性參議員來自不同的政治黨派，如宋美齡代表國民黨，鄧穎超代表共產黨，史良、劉王立明等代表第三黨派，所有的女性參議員都積極參與了有關婦女的提案

的制定。¹⁷以史良為首的女參議員，還成功地迫使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對女性就業問題作出讓步，於1942年宣佈，政府機構不得拒絕僱用女性或無故開除已婚婦女。¹⁸女性參議員加入進國民參政會，不僅塑造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政治的新形象，更標誌著中國官方開始接納女性政治家進入正式的國家政治組織機構。由此，中國的主要的政黨——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第三黨派——都不得不承認並培養這支女性政治力量。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抗日戰爭時和抗日戰爭之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都認識到中國的戰時動員和戰後國家重建，必須要把婦女力量團結進來。這種意識促成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把團結和動員婦女的重要性寫進他們的黨章之中。因此，在學術研究中，對於抗日戰爭中婦女權力得失的權衡，應該超越戰爭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婦女的生活這一問題，應將抗日戰爭中婦女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參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戰時與戰後中國的社會和政治，以及這種影響是否持久這一問題納入到思考範圍之中。

本書的目的之三是使20世紀中國通史的研究，尤其是抗日戰爭歷史研究，超越目前流行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紛爭史，並給予重慶及其人民在戰爭中的表現應有的認可。作為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重慶為抗日戰爭作出了重大的犧牲和貢獻。自從國民政府於1938年1月正式將其辦公系統搬到重慶，這座城市就變成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的象徵和全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及外交中心。最重要的是，重慶在整個中國抗日戰時動員中都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代表著中國人民和整個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及其市民不僅在精神和道德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更作出了重大的人道犧牲，遭受了無法忍受的痛苦，並且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人道和物質貢獻。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是重慶

¹⁷ 孟廣涵編，《國民參政會紀實》，重慶出版社，1985年，第288—405頁。

¹⁸ 丁衛平，《中國婦女抗戰史研究，1937—1945》，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1頁。

人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犧牲和貢獻增強了中國承受八年艱苦磨難的能力。

譬如，在抗日戰爭年間，重慶地區成為中國最大的武器、彈藥及其他軍備的製造工廠。它提供了國統區消耗糧食量的三分之一，並擔負起全國三分之一的財政負擔。此外，國民政府軍隊中的20%的兵源，共計三百萬人，都徵自四川。在川軍中，646,283名士兵被送到抗日前線。在這些士兵中，死亡人數高達263,991人，受傷人員356,267人，還有24,025人被認定為失蹤。¹⁹該地區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參與，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精心發起的動員活動完成的。婦女組織在重慶發起的國民動員中扮演著十分主要的角色。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治氛圍相對寬鬆以前，重慶則因為曾經是國民政府的戰時陪都，而國民黨政府於1949年被共產黨打敗，所以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貢獻一直都無法得到完全認可。其實，一些資深的西方中國問題學者，如任職於美國聖地亞哥大學的Joseph Esherick，早就竭力主張中外學者應該研究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²⁰但在西方的現代中國史研究中，抗日戰爭史，特別是有關國統區人民參加的抗日戰爭歷史還是一個薄弱環節。有關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的婦女史更是少見。儘管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的抗日戰爭學術著作已經逐漸開始承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但它們還是一如既往地將研究重點集中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政府、政治以及軍事戰場等課題上。更重要的是，現在雖然大陸學術界已經開始注意國民黨和國統區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但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普通老百姓、特別是婦女的貢獻仍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成為學術空白。我希望本項研究能為

¹⁹ 重慶抗戰叢書編輯委員會，《重慶人民對抗戰的貢獻》，重慶出版社，1995年，第85頁。

²⁰ Joseph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1995): 45-76.

學術界提供有關重慶婦女抗日戰爭時期生活經歷的新史料，也希望中外學術界能超越勝利者的歷史，更好地理解重慶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並將注意力引向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歷史的研究，以弄清國統區人民對抗日戰爭勝利的貢獻，而不僅僅是研究根據地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經歷和貢獻。這樣的研究會幫助我們更好的瞭解20世紀中國通史和中國抗日戰爭史。因此，在講述重慶婦女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口述歷史之前，有必要先瞭解一下重慶在抗日戰爭之前的簡要歷史。

重慶簡史

重慶位於中國西南部，位處長江與其主要支流嘉陵江的匯合處，並與四川大多數地區及雲南部分地區都有水陸路連接。雖然重慶與四川及鄰近省份的主要地區也有陸路相連通，但在20、30年代現代公路建成以前，長江是長江上游與外界聯繫的主要通道。在19世紀末，重慶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為了水運系統的樞紐和長江上游及西南地區最重要的貿易中心。儘管如此，重慶在1890年代以前卻沒有任何現代工業，商業經濟的主要內容是西南地區商品的內部再分配。1891年，清政府「開放」重慶為通商口岸，再加上後來清政府的改革，都加速了該地區現代商業企業的發展，引入了現代工業，將該地區的商業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繫了起來。²¹自19世紀末期以來，重慶一直都是中國西南地區的商業中心。在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以前，商業也一直都是該地區最重要的經濟行業。

重慶於1929年建市，1930年代時佔地面積為93平方公里。1938年，重慶成為戰時陪都後，面積擴大到300平方公里——抗日戰爭對重

²¹ 周勇，《重慶通史》，重慶出版社，2002年，第340頁。

慶城市擴展的影響可見一斑。與較發達的上海及其他沿海地區相比，重慶的現代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在1891年至1911年間，重慶才建起第一批現代工廠，主要是生產火柴、棉織、豬鬃加工之類的輕工業。²²儘管在1935年國民黨中央政府入駐四川之前，重慶連年遭受軍閥戰亂，在1911年至1937年期間，該地區的現代工業、基礎設施及城市管理系統仍有緩慢的發展；尤其是1926年，四川軍閥劉湘掌握了該地區的控制權以後，重慶地區的局勢出現了相對穩固的狀況，經濟建設也有了發展。重慶地區的現代化發展建設，主要歸因於這裡獨特的政治勢力結構。清政府被推翻以後，四川便成為眾多軍閥爭奪的焦點。1935年之前，國民黨中央政府對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力不大；甚至1935年之後，國民黨政府的控制力也相對薄弱。四川的地方勢力，如青幫、紅幫和軍閥，仍然是控制當地社會的重要勢力。重慶作為中國西南地區的工商業中心，對軍閥和其他地方勢力的財政收入來源至關重要。因此，中央政府相對薄弱的勢力及其極力想打入四川的願望，加之各地方勢力對重慶的經濟依賴，都為該地區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間。

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重慶地區的基礎設施現代化建設比以前得到較大發展。1927年至1937年年間，重慶市區鋪建完成現代化的公路，市區的公交系統也隨之發展起來。至1937年，已經有88輛為當地人民服務的公共汽車，私家車數量達到151輛，成千上萬輛人力車則代替轎子成為該地區普通百姓最常用的交通工具。²³從1932年到1937年初，重慶與四川其他地區，以及與貴州、湖南、雲南相連的公路也陸續建成。重慶成為戰時陪都以後，戰前建成的省際公路——連接雲南和緬甸的滇黔公路——，就成為中國抗戰時期主要陸路幹道的建設基礎。日本控制了

²² 隗瀛濤，《近代重慶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89-198頁。

²³ 周勇，《重慶通史》，三卷，第857-862頁；隗瀛濤，《中國近代不同類型城市綜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66頁。

中國沿海地區以後，滇黔公路成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與外界聯繫、外界救援物資通過陸路運進國內的生命幹線。²⁴

這個時期重慶的船運業也得到了較大發展。長江上游的民族船運業開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由於歐洲列強忙於戰事，中國民族船運業在長江上游地區發展速度加快。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帝國主義勢力回到了中國，並加入長江上游船運業的控制權爭奪戰中。中國人自己的船運公司卻不斷受到各路軍閥勢力的欺壓，往往被迫向用武力爭奪川東控制權的軍閥提供免費服務。為了躲避軍閥壓榨，一些中國船運企業紛紛與外國競爭者合併，以保護自身利益，這導致該地區的中國船運業發展受到嚴重破壞。

1926年，劉湘鞏固了在川東的地位後，重慶實業家盧作孚創辦了民生船運公司，將長江及其支線的船運業務收復回來。盧先生是位進步而務實的商人，他創辦民生船運公司的宗旨就是服務社會、為大眾提供便利、發展工業和富強國家。²⁵ 盧先生利用他與劉湘的良好關係，採用以充分發揮員工長處和促進勞資與勞力和諧為中心的獨特管理模式，在公司成立僅一個月之後，就開通了重慶通往長江上游合川鎮的線路。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前夕，盧作孚的民生船運公司已擁有47艘船舶、3家分公司、6間辦事處及4家代辦處。公司業務覆蓋整個長江地區，並開闢了重慶至上海沿線的3條長途路線和長江上游的5條短途路線。²⁶

鐵路方面，儘管1936年國民政府特准劉湘成立了「川黔鐵路局特需股份有限公司」，並授予他修建連接重慶與成都、內江及自貢鹽場鐵路的權力，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卻使該項目被迫中斷，致使抗日戰爭前重慶僅有的鐵路是為江北區一個煤礦修建的、長約10公里的輕便鐵道。

²⁴ 李佔才、張勁，《超載：抗戰與交通》，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50頁。

²⁵ 楊繼仁、唐文光，《中國船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第78頁。

²⁶ 周勇，《重慶通史》，三卷，第854-856頁。

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僅有的航空服務由兩家大型航空公司提供，一家是中美合資的中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NAC，以下簡稱「中航」），另一家是中德合資的歐亞航空公司。1931年，中航開通了從湖北漢口通往重慶的航線，並於1933年增加了成渝航線。1935年國民政府進入四川後，中航又增加了重慶至雲南昆明的航線。1936年，為適應重慶新增航空服務的需要，中航陸續在重慶建成3個機場。重慶變成陪都後，這些發展都成為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航空系統的建設基礎。1938年以後，日軍的侵佔使中國航空業被迫逐漸遷出中國北方、中部和南方地區。最後，中航和歐亞航空公司分別將其總部搬到了重慶和昆明。抗日戰爭期間，重慶和昆明就成了中國的航空中心；1941年後，兩地更成為美國根據租借法案為中國提供戰時急需物資的空運生命線。

雖然重慶地區在1880年代末期就已經有電報服務，但該地區的無線電通訊系統直到1928年才建成。1936年，重慶才有了同成都及貴州相通的長途電話服務。儘管重慶戰前的交通和通訊系統僅為該地相對較小的區域和人群提供服務，1938年1月，重慶正式成為戰時陪都後，這些系統也為戰時的通訊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抗日戰爭期間，重慶的電話系統擴展較大，不僅包括市內的三千部電話，還覆蓋了周邊地區，最終將包括雲南、貴州和四川在內的整個西南地區都囊括其中。1941年後，國際長途業務也開展起來，將重慶與香港、美國及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聯繫起來。²⁷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向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在這場戰爭的頭幾個月裡，日軍對中國北部和中部的迅猛攻勢，迫使許多在上海和沿海的中國工業、企業相繼撤退到了湖北。1938年，武漢淪陷，超過三十萬噸的工業設備和物資，以及一萬名技師和工人都困在了宜昌地

²⁷ 周勇，《重慶通史》，三卷，第1153-1154頁；吳濟生，《新都見聞錄》，上海：光明書局，1940年，第105-106頁。

區，等待轉移到四川安全區域。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重慶的交通系統，尤其是民生船運公司，在幫助國民政府和中國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從宜昌撤退到重慶發揮了重要作用。盧作孚調動民生公司的力量，四十天之內，就用船將被困在宜昌的所有工業人員及三分之二的工業裝備和物資運到了四川，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遷移，被譽為「中國工業的敦刻爾克」。²⁸ 盧作孚及其民生船運公司挽救回來的工業設備和人員，幫助中國在四川重新建立起抗日戰爭時期急需的軍事及其他工業，使重慶從此成為中國軍事工業的重要生產基地之一。盧作孚和他的民生船運公司在重慶成為戰時陪都以後的抗日戰爭歲月裡，還在從四川及西南其他地區向前線運輸士兵和物資等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重慶的現代工業出現於19世紀末期，是經過戰前35年的歷程逐漸發展起來的。重慶戰前的工業主要以輕工業為主，尤其是紡織品生產業、蠶絲業和出口商品製造業。重慶的重工業不發達，在1920年代末及1930年代初，只有鋼鐵、電力和水泥等很小一部分重工業。以盧作孚為例，他開辦民生船運公司以後，還創建了民生機械公司、三峽染織公司以及合川水電公司。²⁹ 雖然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重慶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工業發展都遠遠落後於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但重慶卻是長江上游地區的工商業中心。1936年，四川全省僅擁有583間工廠和手工工場，重慶於1933年就已經有415間工廠和手工工場。四川大學的近代史專家隗瀛濤教授指出，如果將1933年的重慶數據和1936年的四川數據相比較，重慶佔據了四川工廠和手工工場總數的71%、工業勞動人數的三分之二。³⁰ 現存的西方學術研究，如美國學者Lee McIsaac的重慶研究，都將抗日戰爭前的重慶描繪成一個十分落後破舊的城市，認為戰時陪都

²⁸ 盧國強，《我的父親盧作孚》，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年，第198頁。

²⁹ 周勇，《重慶通史》，三卷，第856頁。

³⁰ 隗瀛濤，《近代重慶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6頁。

的地位護佑重慶實現了現代化。³¹雖說重慶的戰時地位，以及中國人口與政治、教育、工業及文化機構向重慶的遷移，確實加快了重慶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但重慶地區的現代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發展，早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前就已經生根發芽了。套用研究日本史的著名美國學者 John Dower 的觀點，正如日本在二戰時和美國佔領日本以前就已經有了和平與民主的思想一樣，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的現代化發展也「並不是由外來的思想或強加的想法誘導的，而是由自己鮮活的經歷和對機會的把握而實現的」。³²若是當時該地區沒有存在基礎設施和工業基礎，若是重慶地區和外地遷徙來的人民沒有加入抗日戰爭時期的社會並參與經濟發展的願望，外地遷移來的工業根本無法在 1938 年後如此迅速高效地在重慶落地重建並投入生產。

Lee McIsaac 還提出，「國民政府於 1937 年秋宣佈：『重慶將成為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之一』，使這座城市幾乎一夜之間就從中國政治的邊緣變成了中心」。³³我認為 McIsaac 的論述又一次削弱了重慶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上的重要性。從地理位置上看，如果我們堅持中國的中東部才是中心，重慶也許確實只能算是一個周邊城市。然而在政治上，自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頭十年以來，重慶都是中國反抗帝國主義鬥爭和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跑者之一。在 1911 年辛亥革命的「保路運動」及「護法運動」中，所謂的周邊城市重慶實際上就是革命運動的中心。眾所周知，正是在四川率先掀起的「保路運動」為接下來的辛亥革命拉開了序幕，才使中國由帝制走向共和。不僅如此，重慶在「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運動

³¹ Lee McIsaac, "City as Nation: Creating a Wartime Capital in Chongqing," in Joseph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 174–191.

³²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p. 23.

³³ McIsaac, 2000, p. 174.

中，也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³⁴1927年至1937年的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統治期內，重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與南京政府統治下的區域也是旗鼓相當的。到1937年，重慶作為西南都市中心，與上海、漢口等通商口岸城市相比，雖然硬件設施——通訊和交通系統、現代工廠和街道的數量等，發展相對落後，卻並不缺乏注重革新和進步的現代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一個本質上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社會文化環境，已經在該地區發展起來，幫助重慶在抗日戰爭中很快由一個地方性中心轉變為民族中心。³⁵儘管抗日戰爭，尤其是重慶的戰時陪都地位，確實為重慶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使它從地方性中心轉變為了國際知名的戰時首都，但重慶在抗日戰爭前的發展，以及重慶人民的主觀努力和對抗日戰爭歷史的貢獻，不應被忽略。

美國知名社會學家William G. Skinner很早就提出，近代史上中國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而這種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現在區域性和地方主義上。³⁶國民政府1928年在南京成立以後，對中國的控制權僅限於中東部地區的一部分，中國其他地區則由不同的地方勢力控制，所以南京政府說不上是甚麼政治中心。其實，國民政府的真正政治核心地是在遷都重慶之後才更清晰地顯現出來。是重慶成為陪都後的八年抗日戰爭，使國民政府有機會扮演中華民族領導者的角色，也是這一角色確立了國民政府在中國的政治核心領導地位。學術界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史上有關中心與邊緣的問題。

我們也應當瞭解，選擇重慶作為戰時陪都並非出於偶然。重慶地處

³⁴ Danke Li, "Culture, Political Movement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Chongqing Region, 1896–1927,"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³⁵ Danke Li, "Popular 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Anti-Imperialist and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Sichuan," *Modern China*, 30.4 (2004): 470–505.

³⁶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內陸中心，憑藉其山地優勢，基本上消除了日本軍隊從陸上襲擊的可能性，所以相對安全。加上重慶與長江流域及四川其他地區水陸相連，使得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能夠發掘利用該地區的富饒資源，並借此建立起維繫戰時國家民族生存的政治經濟系統。中國能夠經受住八年艱苦的抗日戰爭，很大程度上因為從中國其他地方遷移過來的政治、工業系統，與重慶地區富饒的人文、物質資源和已有的工業基礎及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潮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正是這種結合，使得重慶在抗日戰爭期間，能建立起當時中國唯一的工業綜合體——其範圍東至長壽、西至江津、北至合川、南至綦江。這個工業綜合體在1938年建立之初，有200家從外地遷移來的工廠和企業（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到1940年為止，包括159家軍工廠、17家熔煉工廠、23家能源工業企業、120家化工廠、62家紡織廠和48家其他工業企業，總數達到429家。至1944年，在中國註冊的4,346家工廠中，重慶就有1,228家，成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工業的命脈。³⁷

在八年抗日戰爭期間，重慶還成為了中國全國性的教育、出版、新聞媒體、圖書、音樂及藝術中心。繼國民政府遷都後，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中央廣播電台、國際廣播電台以及包括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三聯出版社在內的所有主要出版公司，都紛紛將其總部遷移到了重慶。中國反映各種政見的主流報紙也在抗日戰爭中遷移到了重慶，其中包括：國民黨的官方報紙《中央日報》、中共的官方報紙《新華日報》、以及代表中間階層政見的《大公報》。大多數中國高等教育機構也都紛紛遷移到西南地區。在抗日戰爭年代，中國的108所高等教育機構中，有57所遷移到了西南地區，其中40%搬到了重慶；另外有17所停業，還有25所分別遷到上海租界或香港。³⁸

³⁷ 周勇，《重慶通史》，第874頁。

³⁸ 周勇，《重慶通史》，第872-873頁。

重慶還在抗日戰爭年代安置了大量的流亡難民。1937年底，中國中東部地區淪陷於日軍手中，數百萬計的中國百姓被迫離開家園，開始長途跋涉、向西南地區安全地帶轉移。其中很多人都來到了四川，特別是重慶。根據1937年重慶的市政統計數字，該市人口數為475,968人次；到1945年，這個數字就超過100萬人次。1946年，重慶人口又新增加了25萬人，這使該市成為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的都市之一。³⁹大量外地人口湧入四川，重要的政府、工業、文化、教育和傳媒機構向重慶遷移，這都為該地區乃至全中國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帶來了深遠的變革。

大量外來人口湧入四川，為該地區帶來了新的社會文化活力。譬如，「重慶人」定義的改變就是外來人口遷移所帶來的結果。除了下江人和重慶本土人之間存在的競爭及地域環境造成的文化觀念差異，抗日戰爭期間本地人和下江人在重慶地區同生死共存亡的八年經歷，使所有生活在這裡的人都成為了「重慶人」。本書涉及的重慶婦女的定義既包括本地的婦女，也包括外來的婦女。被重慶本地人稱為下江人的流亡難民，不論男女，都為該地區帶來了特有的技能、地方文化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八年抗日戰爭中，當下江人與重慶本地的文化風格發生碰撞時，當所謂的「中心」和「邊緣」交換了地點時，焦慮、恐懼、競爭及前所未有的戰時文化融合，成為了重慶地區抗日戰時期生活與文化的重要組成分。

在西方，抗日戰爭時期非傳統定義的、非主流的文化，特別是社會性別化的中國抗戰時期的難民與流亡文化，只得到相對很少的學術關注。在現存為數不多的有關抗日戰爭和難民大遷移歷史的學術著作中，學者也往往將焦點集中在正式的、穩定的、代表男性國家結構的、以及精英階層所創作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上，很少涉及婦女日常生活中對抗日戰爭文化作出的貢獻。本書把婦女對抗日戰爭難民及流亡文化形成的作

³⁹ 隗瀛濤，《近代重慶城市史》，第399頁。

用，以及該文化對重慶地區乃至全國社會及政治的影響，納入現有的學術研究之中。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的生活文化是很有研究價值的。大量難民從中國的四面八方流入重慶地區，將全國各地的文化與傳統都帶到了戰時陪都，並與重慶的本土文化相融合。這種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戰時及戰後重慶地區的文化和生活。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帶動更多的學者從事有關抗日戰爭文化方面的研究。

抗日戰爭期間，重慶也是各種黨派政治鬥爭的戰場。在西方，關於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政治的學術研究，長期以來都被「勝利者的歷史」模式的簡單思維方式牽制著。1990年代以前，一批像美國Lloyd Eastman和Maria Hsia Chang這樣對國民黨持批評態度的學者，使西方讀者們相信，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體系是保守而腐敗的，是建立在蔣介石個人獨裁統治之上的。由於蔣面對的對手是具有嚴格組織紀律、並且民眾化的中國共產黨，蔣的獨裁統治最終於1949年垮台。⁴⁰即便Eastman和Chang是對的，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是保守和腐朽的，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建立了個人獨裁，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政治也遠非僅被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和國民黨的壟斷所統治的。

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侵略軍對中國中北部地區的迅猛攻勢使蔣介石和國民黨都意識到，要存續自己的勢力基礎——國家政權，必須有全國人民和政治力量的支持。為了贏得這種支持，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於1937年9月與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建立起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中國共產黨和第三黨派便於1938年提出建立國民參政會、力倡憲政運動的要求，以此作為公眾對憲政運動發表公開意見的論壇。雖然第二次國共統一戰線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和國

⁴⁰ Lloyd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Maria Hsia 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Fasc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民黨之間的爭紛仍然不斷，國民參政會帶來的新政治氛圍，卻使中國共產黨和第三黨派走上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政治的正式舞台，並使得參與戰時政治成為了現實。

根據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達成的第二次統一戰線協議，中共的軍隊被收編成為國民政府麾下的八路軍，並得到許可，在陪都重慶設立由周恩來及其妻子鄧穎超領導的八路軍辦事處。中共南方局也在八路軍辦事處的掩護下秘密地運作起來。共產黨的官方報紙《新華日報》及期刊《群眾》等，也被允許在重慶出版發行。此外，共產黨還能在他們的印刷店內出售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及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譬如艾思奇等人的著作。第三黨派也紛紛在重慶出版刊物，並積極運用他們的出版物進行抗日戰爭的宣傳和動員工作，擴張自己的政治影響力。⁴¹

雖然國民黨仍然試圖制約中共和第三黨派的各項活動，但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中共和其他政治團體都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並能將這種自由轉移到政治活動之中。除了致力於抗日戰爭動員，中共和其他黨派還利用這些自由和與抗日戰爭相關的活動，為自己在中國戰時政界的話語權贏得了進一步的認可和發展機會。他們的話語權也反過來對國民黨政府造成相應的壓力，迫使國民黨讓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能參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家政治，而不僅僅是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由此，以1938年和1941年分別成立的國民參議會和民主政團同盟為代表的大規模的戰時憲政運動，也紛紛粉墨登場，使重慶在抗日戰爭期間變成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戰場。⁴²

90年代初期，T'ien-wei Wu和其他幾名美國學者在他們「關於抗日戰

⁴¹ 張友漁，〈三進新華日報〉，《新華日報50年》，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年，第7-11頁。

⁴² 劉煉，〈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的民主憲政運動〉，《重慶抗戰紀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問世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7年，兩卷，第249-282頁。

爭時期中國政治和第三黨團政治」的研究中指出，儘管西方早期有關抗日戰爭的研究總把戰時中國政治描述成蔣介石的個人獨裁統治，當時的政治現實卻是多個黨派對權力的爭奪角逐。⁴³香港學者洪長泰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指出，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學者積極投身於抗日戰爭宣傳並極力主張社會變革，他們的努力為「新政治文化」的出現提供了機遇。⁴⁴香港大學學者 Louise Edwards 在她2007年出版的有關中國婦女運動的研究中也揭示，婦女作為社會團體，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成為了正規政治活動的活躍參與者。⁴⁵事實上，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中國政治遠比國共兩黨之間的簡單對立鬥爭關係複雜得多。抗日戰爭時期相對激進的、多黨參與的憲政運動的興起，並不是因為國民黨改變了其反共的立場，而恰恰是因為中國非國民黨的其他政治力量變得相對強大。

台灣和大陸的學者就抗日戰爭時期到底有多少全國性婦女組織存在分歧。⁴⁶但他們都承認，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和其他政治團體在抗日戰爭時期都分別成立了婦女組織及分支機構。僅在重慶，1941年在市政府登記的婦女組織就至少有40家。⁴⁷抗日戰爭期間有至少三家全國性的婦女組織，吸納並認可來自所有政治黨派的婦女。這三家組織是：中國婦女

⁴³ T'ien-wei Wu, "Contending Political Forc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in *China's Bitter Victory*, ed., James C. Hsiung and Steven I. Levin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2, pp. 51-78.

⁴⁴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270.

⁴⁵ Louise Edwards, *Gender, Politics, and Democracy: Women's Suffrage in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⁴⁶ 如台灣學者呂芳上認為，抗戰期間重慶至少有七個全國性的婦女組織，其中包括三青團的婦女組織。見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女工作〉，見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台北：商務書局，1988年，第378-412頁。但大陸學者則認為，三青團婦女組織不應算為全國性婦女組織，因為該組織沒有包括非國民黨成員。

⁴⁷ 重慶檔案館，《重慶市各婦女團體一覽表》，1941年，0051-2-564，第1-7頁。

慰勞自衛抗日戰爭將士總會、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以下簡稱「保育會」)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⁴⁸(以下簡稱「新運婦指會」)。更重要的是，這三家婦女組織都在動員中國婦女支援抗日戰爭及提高國統區婦女生活水平的運動中，扮演了領導角色。

這三個組織的總部，都在重慶成為戰時陪都以後紛紛遷移至此，它們的負責人同時還兼任其他抗日戰爭時期婦女組織的領導職務。這些婦女領導人包括：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著名女律師及第三黨派領導人史良，以及馮玉祥將軍的妻子、教育家、基督教全國婦女總會領導之一李德全等。這些來自各個政治力量的婦女們，儘管持有不同政見，對發動和組織婦女抗戰的方法及目的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她們都能並肩戰鬥。她們共同奮鬥的目標是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提高中國婦女的生活水平。她們能夠、並願意彼此聯繫、共同分享抗日民族主義和男女平等主義的信仰。這種信仰使她們超越了歷來的黨派界線，可以在不同黨派組織之間求大同存小異，並創造出一支精悍的婦女聯合力量。她們的努力使這些聯合的婦女組織登上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政治的大舞台，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這些組織起來的婦女團體，紛紛積極投身於中國抗日戰爭動員活動之中。她們的活動包括：慰勞前方將士，募款及物資籌集，為受傷、退役和新入伍軍人提供服務，為軍屬、戰時兒童的福利和教育提供幫助，培訓並組織「鄉村服務團」，動員農村婦女並組織她們進行戰時生產。抗日戰爭時期，婦女為軍人及其家屬所提供的服務，對鼓舞抗日戰爭士氣十分重要，同時也為這個飽經戰亂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了心理上和感情上

⁴⁸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在宋美齡倡導下，於1937年八月在南京成立。該組織旨在團結全國各界婦女投身抗日救亡動員工作。當時，各黨派婦女領袖均參與了宋美齡主持的會議成立工作及之後的工作。

的慰藉。婦女團體在國內外籌款和募集物資方面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這些成就不僅直接為支持抗日戰爭的多項活動提供了資金支持，更增強了婦女團體本身的力量。

在中國歷史上，戰爭動員協調工作歷來是男人的天下。抗日戰爭時期，婦女團體在全民抗日戰爭動員工作中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使她們在那些歷來將婦女排斥在外的戰爭動員協調活動中成為了積極分子，並將她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從傳統上的幕後支援角色轉到了幕前主演，使她們從無名英雄變成了有名英雄。在重慶地區，有組織的婦女抗日戰爭動員工作並不局限於城市精英婦女的動員工作以及赴前線慰勞軍人的活動。抗日戰爭時期的婦女團體還組織了婦女鄉村服務隊，將婦女輸送到四川農村的56個鄉鎮，開展抗日戰爭動員工作。這些鄉村服務隊在農民中進行廣泛的抗日戰爭宣傳，在農村進行大量工作。她們的工作包括：教農婦們簡單的漢字和實用技術，組織農婦參加各種婦女協會，以及培訓農婦成為地方婦女幹部。抗日戰爭期間，重慶地區婦女團體的鄉村服務隊，培訓了超過20萬名以上農婦，參與支援抗戰生產和地方政治。一位大陸學者說過，就這些組織的數量和規模、影響及範圍、活動密度而言，都超過了中國之前所有的婦女運動。⁴⁹

雖然「五四運動」中的婦女解放運動為後續運動打下了基礎，抗日戰爭期間的婦女運動與之前的運動相比，還是存在不同。「五四」期間的婦女運動大多由城市裡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婦女們組織並參加，其影響力僅限在中國中上層婦女之中。而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婦女運動，則將抗日戰爭動員和提倡男女平等的運動相結合，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地區的城市與周邊鄉村的大量婦女人口，規模空前地參與到抗日戰爭動員和婦女運動中來。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婦女運動已經打破了精英階層的局限，深入到重慶周邊的鄉村，影響了數十萬鄉村婦女的生活。抗日戰爭

⁴⁹ 劉寧元，《中國婦女史類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時期重慶地區的鄉村婦女運動是一個重要課題，有待學者們注意。以上闡述的就是與本書口述史有關的重慶地區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環境。

史學史

1937年至1945年的中國抗日戰爭在美國和中國的學術研究中並不是新課題。但有關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婦女的研究相對而言卻是比較新穎。在這裡，我主要介紹西方有關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

早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間，就有大量美國記者，如A. T. Steele Jr.、Edgar Snow、Theodore H. White、Peggy Durdin和Agnes Smedley等人，開始撰寫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文章。儘管這些記者，如Agnes Smedley，寫過關於中國婦女的文章，但報導的注意力主要還是放在男性身上。到1950年代，冷戰思維和麥卡錫主義使美國學術界暫時中斷了對這個課題的研究，因為任何有關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貢獻，或者對國民黨的腐朽政治進行批評的學術研究都會被反共陣營貼上「共產黨同謀」的標籤。

接下來的十幾年裡，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中，不僅出現了新一輪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熱潮，在美國還出現了對該課題的新研究方法。1970年以來，在美國，學者們對中國抗日戰爭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流派。

第一個流派是「革命學派」，他們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取得政治統治權力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認為中國共產黨利用抗日戰爭擴充了自己的實力。因此，儘管該學派的學者們對於這場戰爭到底在哪些方面對中共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做了多大的貢獻這些問題上持不同見解，但他們都把抗日戰爭史當作中國共產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進行研究。

第二個流派是「國際關係學派」，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參戰國家間對外

政策的制定和國際關係問題上。該學派的學術著作多是分析和批判美國和其他西方勢力對中國的戰時政策，而非研究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抗日戰爭史。該學派的多部著作都提出，正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誤解及其基於誤解制定的政策，導致美國令中國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損失」。

第三個學派主要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戰時國民政府、第二次國共合作及統一戰線的問題，解釋為甚麼國民黨於1949年輸給了中國共產黨。

第四個學派主要關注日本佔領地區的中國。其學術著作不僅研究中國被日本控制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學術活動，還涉及到一些中國政治團體和日本佔領勢力之間存在的反抗和勾結。

最後一個學派是用歷史和記憶的相互作用的方式研究抗日戰爭史，以此解釋過去六十年中人們對於抗日戰爭的記憶是甚麼樣的、這些記憶如何反映並塑造了中國自1945年以後的歷史。

儘管上述學派、尤其是「革命學派」和被佔領地區學派的一些出版物，觸及到了共產黨控制下的根據地地區和日佔區的婦女問題，但有關中國戰時陪都重慶的婦女生活經歷的英文著作卻很匱乏。1992年，美國一個學術小組一起研究並出版了《中國艱辛的勝利：1937年–1945年的對日戰爭》。編者們在書的前言中指出，「這本書最根本的目的是要用全面分析的方法使我們對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有最好的理解」。⁵⁰不過，雖然這本書的作者們對抗日戰爭的許多重要問題都作出了清楚而精彩的解釋，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的參與和貢獻卻仍然被作者們忽視了。這和歐美史學界對婦女與戰爭的研究現狀有差距。

歐美婦女在二戰中的參與及貢獻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1994年，香港學者洪長泰在美國出版了《戰爭與大眾文化：1937年–1945年現代中

⁵⁰ James C. Hsiung and Steven I. Levine, ed.,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New York: M. E. Sharpe, 1992, p. xxii.

國的反抗》。該書中有一小部分涉及抗戰時期大眾文化中的女性反抗形象。洪長泰的這本書談論的中心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化，而不是婦女，所以他對婦女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戰時媒體如何描述婦女，而並沒有、也沒打算談論婦女到底在抗日戰爭時期做了甚麼、有何貢獻。⁵¹

90年代中期，為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大陸和台灣舉行了許多東西方學者們參加的學術會議。然而，這些會議卻絲毫沒有提及婦女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2000年，由Wen-hsin Yeh主編的《造就中華文化：通向和超越現代之路》一書在美國出版。該書包含兩篇關於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婦女的文章：一篇是Prasenjit Duara關於滿洲國中產階級婦女講師們組織的道德學會的研究，另一篇是Paul Pickowicz關於戰後影視作品中的戰時婦女的研究。這兩篇文章都提出，雖然抗戰時期「新民族主義討論的出現，使婦女們的行動空間有所擴大，並超越了傳統觀念上的女主內、男主外的限制」，婦女仍然得服從以父權國家為代表的新的民族主義權威體系。⁵²美國學者Joshua Howard 2004出版的《戰時工人：1937年–1953年中國軍工廠裡的工人階級》，為理解重慶抗戰時期的軍事工業及軍工系統工人階級的歷史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該書並未談及婦女問題。⁵³香港大學學者Louise Edwards 2007年出版的研究成果——《社會性別、政治和民主：中國婦女的選舉權》，是西方出版的第一本關於1890年代末到1940年代末中國婦女爭取選舉權運動的綜合概況的書籍。這本書包含一些關於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婦女的簡要論述，但由於它並非致力於研究抗日戰爭中的婦女，僅僅闡述了一些參與戰時政治的知名的

⁵¹ 見注 42。

⁵²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⁵³ Joshua H. Howard,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 1937–1953*,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精英婦女組織，並未打算提供重慶地區普通婦女抗戰時期經歷的信息。⁵⁴

2007年和2008年，美國學術界分別出版了兩本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書。第一本是2007年出版、名為《戰爭中的中國：1937年–1945年中國的地區》的編著。⁵⁵該書的三個編者——Stephen R. MacKinnon、Diana Lary和Ezra F. Vogel都是當今中國研究的知名美國學者。但該書沒有一個章節涉及到中國的戰時陪都重慶，也沒有關於抗日戰爭中婦女經歷的相關內容。第二本是Stephen R. MacKinnon 2008年出版的《武漢1938：戰爭、難民和中國的現代化》。⁵⁶該書描述了1937年12月，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淪陷給日本人，武漢自1938年1月到10月成為中國抗日戰爭之都，並在動員組建中國抗日力量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該書簡要討論了婦女在武漢地區參與抗戰的歷史，並強調了武漢在南京和重慶之間這個關鍵時期扮演的重要角色。武漢抗日戰爭是重慶抗日戰爭陪都史的前奏，為我們更深入的瞭解和分析在重慶發生的抗日戰爭史提供了平台。

過去25年裡，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大陸的學術界也相對開放。很多以前查不到的資料和檔案，現在都已解凍，可以陸續查閱到。資料檔案的開放以外，相對寬鬆的政治和學術環境也使中國大陸的學者能夠根據史料記錄做研究，並得出自己的學術結論、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而不僅僅是再附和政黨的聲音、跟從政黨的路線。在中國大陸，從1980年代起，抗日戰爭史已經漸漸變成了熱門的學術領域。1991年，一本新的學術期刊——《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開始出版發行，直到現在還是研究抗日戰爭史的重要期刊。1990年代以來，儘管在中陸有關抗日戰爭的眾多文章、書籍以及系列叢書相繼出版，關於抗日戰爭中中國婦女的研究

⁵⁴ 見注 43。

⁵⁵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⁵⁶ Stephen R. MacKinnon, *Wuhan, 1938: War,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依然處於邊緣地帶。1990年重慶出版社出版了五卷《南方局黨史資料》，其中第五卷登載了三篇有關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婦女的文章——黃靜汶和黃慧珠的《回憶中蘇文化協會婦女委員會》，陸慧年的《中國婦女聯誼會》，及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青年組編寫的《南方局領導下的婦女運動》。⁵⁷但這三篇文章基本上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並把抗戰時重慶婦女們的工作與貢獻都記在共產黨的功勞簿上。1991年重慶出版社出版的《重慶抗日戰爭紀事續編》登載了錢之光、童小鹏、劉昂、牟愛牧合寫的〈懷念饒國模同志〉。⁵⁸饒國模是一位富有的重慶女地主，她的子女均於抗日戰爭前後加入了共產黨。抗日期間她積極支持中共八路軍辦事處在重慶的工作，為該辦事處出錢出地。八路軍辦事處在重慶的辦公大樓就是由饒幫助建設的。此外，她也利用自己的身份掩護中共地下黨在重慶的活動。這篇文章主要是表彰饒對中共的貢獻，並非意在展示重慶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的活動。

在這裡，我有必要介紹一下重慶學者在過去30年來對抗日戰爭研究所做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重慶地區的學者在抗日戰爭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沛然。1979年至1990年之間，重慶出版了一批以史纂和史考為中心的抗日戰爭研究的學術著作，如《重慶抗日戰爭紀事》、《抗日戰爭後方冶金工業史料》、《國民參政會紀實》、《回憶南方局》、《大後方的青年運動》等。1990年至2006年間，重慶學者們對抗日戰爭研究的視野有所擴展，其研究成果包括《重慶國民政府》、《新華日報史》、《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紀實》、《重慶大轟炸》、《中國遠徵軍入緬抗日戰爭紀實》等書籍和一批學術論文。2007年以後，抗日戰爭研究在重慶有了更大的拓展。重慶市政府決定實施「重慶中國抗日戰爭大後方歷史文化

⁵⁷ 南方局黨史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五卷，第309-316頁，第385-400頁，第461-477頁。

⁵⁸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重慶抗戰紀事續編》，重慶出版社，1991年，第315-322頁。

研究與建設工程」，撥給大量經費。從2007年至2011年，重慶已出版了8卷10本抗日戰爭叢書，其中包括《抗日戰爭大後方歷史文獻聯合目錄》（上中下三卷）、《抗日戰爭歌謠匯編》、《英雄之城——大轟炸中的重慶》等。但三十年來，重慶出版的抗日戰爭學術書籍沒有一本是有關重慶婦女的。近年來，大陸陸續出版了一些有關抗日戰爭時期婦女的著作，如《抗日戰爭女性檔案》和《新四軍女兵》等書籍，⁵⁹但至今未有關於抗戰時期重慶婦女的專門著作面市。

在台灣，抗日戰爭歷史早已成為一個熱門的學術研究課題。台灣學術界的口述史研究也非常活躍。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早在1957年便安排口述史研究計劃，並於1959年開始工作。該研究所於1984年成立口述史組，近20年來積極從事抗戰時期婦女口述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2004年，該組出版了長達600頁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該書記錄了十位中國婦女的抗日戰爭經歷。其中好幾位被採訪的婦女都曾經在重慶生活，她們的抗日戰爭經歷和本書中重慶婦女的經歷有許多相似之處，可以相互呼應。此外，台灣學者也出版了有關抗日戰爭時期慰安婦的口述史。⁶⁰然而，和中國大陸一樣，台灣已經出版的關於中國婦女和抗日戰爭的文章及書籍，在內容、理論和研究方法論上都還需進一步提高。

在中國大陸，雖然婦女問題的研究和主張男女平等的討論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但西方概念中的女性主義在毛澤東時代被劃為資產階級思想，取而代之的是「婦女能頂半邊天」的革命女性主義。西方女性主義和社會性別研究，是改革開放之後作為學術科目和學術領域被重新介紹到中國的，在中國大陸尚屬相對新穎的領域。1980年代以來，西方女性主

⁵⁹ 張西，《抗戰女性檔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年。朱強娣，《新四軍女兵》，濟南出版社，2003年。

⁶⁰ 吳姿萱，《慰安婦：再現，平反／求償，與介入的政治》，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2009年。

義和女性研究被重新引入中國以後，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有關婦女的研究項目也蓬勃地發展起來。近年來，中國大陸不乏女性研究的學術著作，其中包括大陸著名女性研究學者李小江主持的有關婦女與戰爭的上下兩冊口述史。⁶¹但是，這部口述史關注的主要對象是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婦女，沒有涉及到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控制下重慶的婦女。這就說明，在中國大陸，有關中國婦女和抗日戰爭史的研究還沒有完全走出中國革命歷史框架的影響。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中國大陸舉行過一系列的慶祝活動。這些活動促使許多有關婦女和抗日戰爭的學術論文的出版。雖然這些出版物，如《南方局黨史資料》，包括一些有關婦女的文章，有些作者也認識到婦女在抗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婦女對抗日戰爭作出的貢獻依然被歸於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並被看作抗日民族主義運動的附屬產物。在「誰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的研討中，革命主義和民族主義主題依然壓過了女性主義、女權主義以及婦女主題。2000年，丁衛平出版了《中國婦女抗日戰爭史研究》一書。該書被中國學者們譽為「填補了中國抗日戰爭研究空白」。⁶²該書不僅承認中共控制地區、日本佔領地區以及國民黨控制地區的中國婦女對抗日戰爭作出的貢獻，還指出在這三個不同體系下，存在著不同的婦女組織和抗日戰爭動員活動。不過，該書作者還是主要用革命和民族主義分析模式解析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的角色與地位，並認為，在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根據地的婦女運動比在國民黨控制的重慶地區的婦女戰時活動具有更重要的歷史意義。

在西方，歷史學界自1970年代初期起就開始關注中國婦女的研究問題。如王政在她1999發表的《中國啓蒙運動中的婦女》中指出的，由於

⁶¹ 李小江編，《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⁶² 任貴祥，〈中國婦女抗戰史研究，1937-1945簡評〉，《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7卷第3期，第232頁。

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做中國婦女研究的西方學者們無法得到原始資料，他們的學術研究主要依賴於在中國公開發表的、國家政策允許的和官方承認的著作，所以他們的研究是有局限的。⁶³在西方，學者有關婦女與抗日戰爭的研究，還是局限在中國革命史的框架內。雖然在美國近期有些學術研究質疑抗戰時期中共是否有清晰的「婦女政策」，總體而言，當涉及婦女時，大多數西方學術研究都將婦女當作被研究的對象，而不是積極的歷史參與者與創造者。西方學者們感興趣的主要是中國共產黨是否履行了對中國婦女解放作出的承諾，而他們得出的結論往往都是負面的。例如，在分析中共對根據地婦女的政策時，美國學者Patricia Stranahan、Judith Stacey和Kay Ann Johnson都提出，抗日的戰爭環境使中共制定了一套相當保守的婦女政策：該政策既要求婦女在經濟上為抗日戰爭作貢獻，還要求她們繼續履行在家庭和社會的傳統義務。這些作者提出，抗日戰爭時期的婦女為實現中國的民族主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⁶⁴

絕大多數有關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西方學術成果，除香港大學學者Louise Edwards 2007年發表的研究作品以外，大體上將中國共產黨1949年的勝利歸功於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對數百萬中國農民的革命動員。在西方，70年代出版的、有關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中國婦女及社會性別的主要著作，基本將焦點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農村根據地地區，而對國民黨控制下的城市地區的婦女，尤其是她們的生活經歷，關注甚少。這種研究方法無疑否認了國民黨統治地區中國婦女在中國歷史中的代表性和作用。在西方，有關20世紀中國婦女歷史的研究領域還存在另

⁶³ 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⁶⁴ Patricia Stranahan, *Yan'an Wome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3.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外一個問題，即學術關注的焦點比較相對集中在五四時期和1949年以後，而1930到1940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卻很少有人關注。事實上，清末以來，中國婦女始終堅持不懈地為爭取自己的權力和民族的解放而鬥爭。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將重慶地區抗日戰爭年間，普通婦女的所作所為寫進中國歷史，喚起人們對她們以及這段歷史的注意。

研究方法

我是一名生於重慶，長於重慶，並在中美都受過教育的歷史學者。對家鄉的感情使得重慶總是和我貼心貼坎，長期在我的學術研究計劃之中。我對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婦女的口述歷史的研究興趣，可以追溯到1995年夏天。

那年，我回國為博士論文收集有關重慶地區的文化、地方運動和中國共產主義早期運動的發展狀況的數據。我到重慶的時候，全市都在為慶祝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舉辦各種各樣的活動。我看見了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16本書組成的一套關於重慶與抗日戰爭的系列新書，還旁聽了幾場有學者和官員們參加的紀念重慶在抗戰中的作用的集會。在這些慶祝活動中，我發現，所有的書籍和會議論文中，沒有一個談論到婦女及她們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和地位問題。我開始疑惑，為甚麼根本沒有提及婦女問題？在重慶八年的艱苦抗日戰爭時期內，婦女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嗎？

我詢問我母親她的抗戰經歷。她於1923年出生，一生都在重慶度過。讓我吃驚的是，她告訴我，重慶地區的婦女在抗日戰爭中都非常積極。就她自己而言，儘管當時她還只是個中學生，卻參與了很多抗戰動員活動。她向我講述了許多豐富多彩的故事。雖然事隔半個世紀，她還記得抗日戰爭時期她生活過的地方、做過的事情、以及她怎樣應對各種

困難和挑戰。她也清楚地記得，當時她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所學唱的許多抗戰主題歌。我在重慶市檔案館和歷史圖書館查到的關於重慶抗日戰爭和婦女的資料，證實了我母親所講的那些故事，證明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確實是積極分子。雖然重慶歷史圖書館藏有不少有關本地婦女與抗日戰爭的資料，但那些資料大都沒有像我母親的那些故事那麼親切動人。因為公開發表的文章多半比較抽象、高調，而且所述之事大都離老百姓的真實生活較遠。由此我意識到，寫一本有關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婦女的口述歷史，會使我們對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人文維度以及普通婦女的抗戰生活有一個更加深入的理解。

1999年到2007年間的每個夏天，我都去採訪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在重慶地區的婦女。2005年，亞州學術組織和自由人基金會撥給了我一筆暑期師生學術研究經費，我帶著三名美國女學生回到重慶，繼續進一步的採訪工作。

採訪工作是很辛苦的。首先，許多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在重慶的婦女已經仙逝；其次，也不容易尋找到尚還健在的、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在重慶的婦女。我前後共採訪了50多位婦女，但不是所有接受採訪的婦女都能講述她們的抗戰經歷。有些婦女的記憶已經非常模糊，結果採訪無法使用。我把其中35人的故事收進了本書之中。我和她們的聯繫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我母親和她和朋友、同事的關係網；另一個是我妹妹和她的關係網。我母親一生生活在重慶，她的朋友、同事，大都親身經歷過抗日戰爭。我妹妹是重慶的一名中學英文老師，我採訪的很多婦女都是通過她的學生家長介紹找到的。我母親的朋友中有些是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組織和第三黨派的成員，所以我有幸採訪到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的一些學生和老師。

在採訪之前，我都會告知採訪對象我的採訪目的：我告訴她們我正在寫一本關於中國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婦女經歷的書，並在採訪之初就取得了她們的同意，讓我可以把她們的故事寫進我的書裡。本書中所

用的人名，全是受訪者的真名實姓。大體上，被採訪者們在講述她們的故事時，沒有表現出不願意和勉強的情緒。儘管在採訪中被採訪者有時會對時間、地點及一些特殊細節產生記憶偏差，甚至還會自相矛盾，但我們沒理由懷疑她們的回憶是不真實的活被誇大的。我對這35位婦女中的大多數人都進行了多次採訪，以澄清謬誤。採訪中的對話並不總是按照邏輯順序進行的，而且有些細節是根據多次談話內容整理出來的，因此，為了提高閱讀的流暢性，本書記錄的故事經過了編輯整理。

一般來講，我對所有被採訪者都詢問了同樣的基本問題，然後根據她們個人背景經歷的不同，再分別增加了有針對性的問題。多數採訪我都錄了音。2005年，由於亞州學術組織和自由人基金會的慷慨支持，我們裝備了攝像機，將一些採訪過程拍攝了下來。自從我1999年開始做採訪以來，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生活過的婦女的人數每年都在減少，我採訪過的婦女中，有些已經不在人世。值得欣慰的是，她們的聲音和她們的抗戰記憶，已經被記錄於本書之中，將永久地成為重慶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部分。

本書也使用了許多抗日戰爭前和抗日戰爭中出版的婦女期刊和雜誌。其中包括《婦女生活》半月刊。該刊物最初於1935年在上海發行，主編是第三黨派成員、進步女性沈茲九。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該期刊遷址到武漢，之後在1938年又遷移到了重慶。《戰時婦女》雜誌每十天發行一次，1937年在武漢創刊，其女性主編王汝琪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新運婦女》月刊，則是1938年由新運婦指會在重慶創辦的，其女性主編鄭煥英是一名第三黨派的成員。《婦女新運通訊》半月刊，也是新運婦指會1938年在重慶創辦的，其女性主編夏英喆是位中共地下黨成員。《婦女新運》是國民黨官方報紙《中央日報》的副刊。《中央日報》於1938年底遷至重慶，隨後就創辦了這個副刊。《婦女之路》創刊於1940年，是國民黨統治下重慶發行的中共官方報紙《新華日報》的副刊，各界人士都曾擔任過其主編，其中包括鄭志東。《現代婦女》月刊創刊於1943年的重

慶，主編是中共黨員曹孟君。《中國女青年》於1940年到1943年間在重慶發行，沒有查到主編的相關信息，只有出版商標明為「中國女青年社」。另外，我還就一些特殊問題查閱了新運婦指會的出版物，如有關鄉村服務隊和松溉實驗區的書籍。這些期刊和書籍都藏於重慶市歷史圖書館。由於重慶是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圖書館收藏了最齊全的有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原始資料。目前新建的重慶圖書館還有專門的抗日戰爭資料室，許多原始資料都已電腦化，可以上網查詢。此外，我還查閱了重慶市檔案館收藏的和市政檔案出版物《檔案與史料研究》中收錄的原始資料。

本書共有三個不同的主題章節，每個部分都有自己的序，突出中國歷史和社會性別研究中提出的主要問題。讀者們可能會意識到，書中大部分故事並沒有嚴格的界線劃分，實際上它們可以被放在三個部分中的任何一個之中。現在的劃分，只是為了使本書內容能得到更好的組織而進行的編排。